

# 再登念楼

■李天扬

时隔八年,再登念楼。念楼者,廿楼也。钟叔河先生住在20楼,便起了这个朴素的斋号。因了《念楼集》《念楼学短》《念楼随笔》《念楼小抄》《念楼序跋》等书的出版和风行,念楼,已成为读书人心中最著名的楼层。

2012年盛夏,我拖着一箱子钟先生的书,第一次登上念楼,请钟先生签名。对我这种莽撞的粉丝行为,钟先生非但不以为忤,还一再说“感谢你读我的书”。不过,钟先生还是道了苦衷,有读者会寄一大包书来,请他签了名寄回。钟先生说,我80多岁了,除了理发,基本足不出户,实在没有力气做那些事。拜托转告大家不要再寄书来。为完成钟先生交办的任务,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

文章刊发后,寄呈钟先生。钟先生回信说“大文叙事如绘”,表扬了一番。对于钟先生的谬赞,我自然不敢自鸣得意。但后来,有梁由之和王平二位编辑出版了厚厚一本《众说钟叔河》,收入了我的小文。看到拙作能与杨绛先生、张中行先生、朱正先生等大家名手的宏文同居一册,小有得意,是难免的了。这次再登念楼,我只带了这一册请钟先生签名。

对本本众人写自己的书,钟先生应该是满意的,曾为之赋诗二首。其一题为“梁王二君编成感赋一首”,诗曰:“友人文字友人编,过誉偏怜不免焉。总是好心和好意,愧多于感我嗟然。”其二题为“二君选择正严,只取三分之一。而于批评商榷之文,则悉予收录。极以为是,再作一首”,诗曰:“匡扶指正吾师,反右遗风偶见之。有则改诸无则不,吾行吾素复笑辞。”两首诗极见个性,非钟先生莫办。

当年,我在评论部工作,还在上海政协《联合时报》写一个评论专栏,敝帚自珍,把专栏文章出了一个集子,寄钟先生求正。大约我在去信里对于杂感和时评发了一通不成熟的议论,钟先生在回信



▲钟叔河

《念楼随笔》

钟叔河著

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里,说了重要的意见:“报人作文,乃是本分。中国现代的散文和杂文,都是在报纸上发生和发达起来的,事实如此。你说的‘杂感和时评’,恐怕也正是杂文的源头和主体。鲁迅和周作人亦均从此起步,从此取得了大的成功。当然真要取得大成功,最后就得走出杂感和时评的圈子。”虽然,过了这许多年,我仍未走出那个圈子,更未取得些微成功,但钟先生的教导,倒是一直不敢忘记的。

钟先生对于我这样并不熟悉的后生小子的来信,也细细作答,既令我感动,也使我不能轻易再打扰先生。如此便过了七八年。己

亥岁末,我到湖南出差,行前,打电话请示,钟先生俯允接见,便特意在长沙多留一天,再登念楼。

在寒冬,钟先生并未在放着那张台球桌的大客厅里待客,而是坐在北屋。房间很小,一榻、一桌、一椅,一架钟先生自己的书。他说,天冷,房间小,开起暖气来,升温就快些。长江流域的冬天湿冷,又无集中供暖,是很不好受的。我刚刚从冰封的沈阳和飞雪的北京南返,觉得还是北方的冬天好。钟先生在小房间里编书作文,倒很是安然。

刚落坐,看到书桌上摊着书稿的校样。最上面一页,是《刘绪

源《翻书偶记》序,话题自然从这位我们都熟悉的朋友说起,钟先生对绪源老师的早逝,连声叹息“太可惜了”。他对上海的《文汇报》和《新民晚报》这两张老牌报纸,评价颇高,回忆了与两家报社副刊编辑的点滴交往。紧接着,他问我:“你从上海来,知道程巢父先生的消息吗?”我马上想起在朋友圈看到的一篇题为《帮帮他!思想者程巢父先生》的公号文章,文章呼吁大家帮助贫病交加的程先生。我找到了点开给钟先生看。他没有细看文字,看了文中的几张照片,他叹道,程先生有学问,文章写得好,不应该这样啊。他说:“我听说现在已经有人捐款了,请你去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希望他的困境已经得解。”说起微信和朋友圈,钟先生说:“手机上的信息,我都不知道,我有青光眼,医生吩咐不要看电脑和手机。”他话锋一转,又说起他的父亲:“我的青光眼,是我父亲去世那时患上的。青光眼与情绪有很大关系。我父亲于1965年逝世,他死于那一年,避开了动乱,没有吃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但我当时十分伤心。”钟先生虽然一直神态平静,语调和缓,但闲谈不过短短十几分钟,就动了几次感情。他的文字平实、克制,又满含深情。正所谓“文如其人”。

聆听钟先生漫谈,是一种享受。去的那天,是己亥年腊月十七,再过半个月,进入庚子年,钟先生将登九秩。一位九旬老人,侃侃而谈两小时毫无倦容。说古论今,谈天说地,评人论事,逻辑之谨严、见解之明澈,实在令人赞叹。漫谈式的聊天,虽然散漫、自由,但正如钟先生身为出版家、文章家所做的工作一般,其实是有

一个核心思想的,那就是“启蒙”,或曰“回归常识”。

钟先生说,有些谬误说得多了,反而成了“常识”。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说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如何如何厉害,比现在强得多。“这怎么可能呢?我就是民国时读的高中,只说国文吧,那时候我们班里的同学,真的能把文章写得通顺的,其实一半也不到。更不要说其他科目了。”钟先生说。其二,现在不少人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作国学的基础教材,好像以前读书人都是从诵读这些书开始的。其实,胡适、鲁迅、周作人的回忆录都在,他们从小是读什么的?《红楼梦》里贾宝玉从小又是读什么的?很清楚么,都是经书。从前官宦人家和书香门弟的子弟,走读书而科举之路的,都是读四书五经的,考的也是经书。“三百千”之类,只是农工商子弟的识字课本罢了。

与钟先生聊天,一定会说到他的书。我看桌上的校样,似乎不是新书,便问他。钟先生说,出版社愿意为他出一套文集,他起名为《钟叔河集》,每一册,都用原来的书名,厚薄不匀,也任其自然。对于这样一套书,我等“钟迷”,自然是要引颈翘首的。

钟先生有一个小专栏名“念楼壁上”,写挂在钟府墙上名家书画的故事。我是特别关注并喜欢的。这次发现,在“念楼壁上”,有一幅钟先生自己的字,这是他给老领导李锐先生102岁生日的祝诗:“满十八进报社,即偷偷学李锐。到今年八十八,仍旧追随不逮。同出自汨罗江,同欠下来生税。骨头同样的硬,当然我比较脆。秀才人情半张,祝再活一百岁。”钟先生的毛笔字,颇有几分知堂老人的笔意。

一进门,我便向钟先生报告:我离开了评论部,现在体育新闻部工作。钟先生未置一词。临别,钟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在报社工作的,要好好做好自己的事。做体育新闻,也有启蒙的意义。”

# 哈金评说赛珍珠

■姚君伟

在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历史上,作家批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短篇小说《水藻行》就是为了塑造他心目中真实的中国人形象而创作的,针对的是赛珍珠的《大地》,包含了他对赛珍珠的批评和否定。当代作家叶兆言的中篇小说《走近赛珍珠》(1999)以虚实相间的艺术手法,描写了赛珍珠在中国的创作和生活。到了2017年,第一位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华人作家、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哈金则借为《大地三部曲》繁体中文版写序的机会,分析赛珍珠1938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介绍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概括《大地三部曲》的文本特征,并简评彭玲娴译本的品质。

关于赛珍珠何以获得诺奖,即使在研究界,都还时常有人以为是因为《大地三部曲》,殊不知,赛珍珠之所以获奖,她为她的父母所写的两部传记,即《流放》《战斗的天使》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的评委之一、瑞典诗人、小说家,也是首位获得诺奖的女作家(1909)塞尔玛·拉格罗芙就说,她投赛珍珠一票,就是因为这两部传记。哈金认为,这两部作品文字“健朗清丽”,富于有关人生、婚姻和文化冲突的洞见,是难得的佳作;和不少诺奖得主一样,

赛珍珠获奖后任凭如何努力,她的写作都未能达到新的高度。谈到这一点,哈金认为,赛珍珠反复强调中国小说说书式的特征,她获奖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内容过于戏剧化,情节离奇或牵强,有时候甚至违反逻辑,结果造成结构失调、章节混乱的缺陷。哈金认为,与此相对,西方小说讲究结构严谨,追求建筑美。当然,中国小说的特征是否就如哈金所说,尚可再做探讨,但是,赛珍珠后期确实写了不少粗制滥造之作,尤其是嫁给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之后,她往往是写什么出什么,未能保持她写《大地三部曲》时的创作水准。哈金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

哈金的序言颇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滤出了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在文本上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点,包括庄重古朴的文风、圣经影响下的语言、类似于寓言的情致。在哈金看来,赛珍珠对她笔下的人物和题材是“宽厚的”“热爱和敬畏的”,而

这一敬畏就体现在小说那庄重而古朴的文风上,小说的语言也明显吸收了《圣经》的语言风格,具有“永恒和沉厚的质地”;哈金认为这种文风“有助于成就一种永恒的感觉,正好适合讲一个古老的故事,使得平实的句子下面暗涌着诗意”。关于《大地三部曲》的文本特征,哈金还特别指出,与文体相关的,或者就是文体带来的是充盈于作品之中的一种类似于寓言的情致。我认为,哈金指出的这一点对我们精准地把握赛珍珠这部杰作十分重要,因为他分析说,赛珍珠通篇都在努力将其小说所讲述的一个中国农民的故事提升到历史之上,使之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她写中国农民,包括中国女性,但又保持某种程度的疏离,具体的人名极少,场景也不点明,以便从中国故事的讲述中抽身出来,将这一故事的特殊性和人类与土地不可分割的普遍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金认为赛珍珠在艺术上是独具匠

心。他的这一独到观察,对许多学者摆脱赛珍珠中国题材书写的真实与否的纠缠颇具启发性。

我想,哈金愿意为彭玲娴译本作序,对这个译本应当是认可的。我们知道,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第一部即《大地》1931年一出版,中国很快就推出译本,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七八个译本(含节译),但有好几种是合译,质量上参差不齐,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新译本,赛珍珠研究者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译本作为参考。现在,彭玲娴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赛珍珠这个三部曲的翻译工程,殊为不易。她不仅把赛珍珠笔下那久远而温厚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而且在译本中加上不少知识性和学术性的注释,包括纠正赛珍珠本人在作品中所犯的错误(如人物关系方面的小疏忽)。最后,她还认为,三部曲第三部的中译名虽沿用《分家》,但在赛珍珠这里,分家的意思不同于中国家庭兄弟切割财产,而可能指南北分裂的民初政局,或主人公王源与他父亲的关系,但更可能是通过洋房与土屋的对比,暗喻主人公在新旧华洋文化间左右为难的心境。我认为,仅凭这一见解,译者彭玲娴就建构了她的学者身份。